

东学  
西渐  
丛书

季羨林  
主编

中国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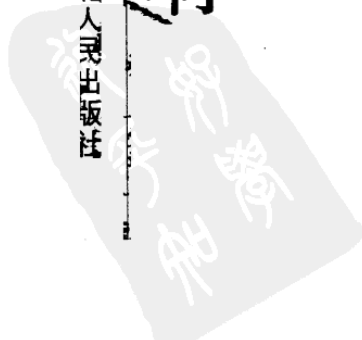
对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

#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8

(东学西渐丛书/季羨林主编)

ISBN 7-202-02560-4

I. 中… II. 朱… III. 中国-哲学思想-影响-欧洲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769 号

---

### 东学西渐丛书

书 名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作 者 朱谦之  
责任编辑 张晨光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装帧设计 慈向群  
责任校对 付敬华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287,000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2560-4/G·496

定 价 20.7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东学西渐丛书》总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我在许多文章中和发言中,都宣扬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我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有感而发的,没有丝毫主观成分。

在这里,关键是一个“交”字,一边倒,向一边流,不能称之为“交流”。古往今来,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文化不论大小一旦出现就必然向外流布。我认为,这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特点,全体人类都蒙受了这个特点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生活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起,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的成分。中国古书上说:“有容乃大”。中国人民最“有容”的,我们肯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

## 2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物质的,只要对我有利,我们就吸取。海容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我们能吸收各种文化,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正表示了这种精神。

但是,中国不但能“拿来”,我们也能“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中国人民与有力焉。

可惜的是,西方国家自从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上其余的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学习。即以中国而论,我们今天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甚至衣着打扮,从头到脚,哪一件不是从西方来的?中国素以美食名扬全球;然而,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余的国家更不必说了。于是乎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响彻全球矣。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以“天之骄子”自命。他们在下意识中大概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指战争而言。其实在其它方面也是这样。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知)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一旦世界有事,我们中国是处在“百战不殆”的位置上的。有识之士,必须承认这一点的。

我曾上面说过,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状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

简短一句话,我们编纂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这里。表面上

讲影响,介绍内容即寓于其中。

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在这里指出,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我们过去都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了。我最近读了几篇关于李约瑟的文章,我才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很难译为外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字,就简直无法翻译。在历史上长期的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是为序。

1998.9.2

# 序 一

朱杰勤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是朱先生精心结构的一部著作。此稿草创于1936年，告成于1938年，终于194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给以高度的评价。新中国建立后，朱先生目睹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伟大的中国文化遗产受到全世界有识者的重视，中西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扩大，朱先生想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来发扬中国文化，从而说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他于是决心把《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用新的观点、方法加以补充修改，改题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重新出版，以广流传。他为修订此书付出很大劳动，自称在一生许多著作中，此书还是较称意的。

根据社会科学分类，此书是中外关系史的

## 2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一部分，即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近百年来，国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多注意于中外史地考证问题，虽然有些学者接触到18世纪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经过，但也只涉及美术、文学、园林建造、漆器和瓷器的外传。可是朱先生之书以诸多篇幅专门论述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并结合法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来谈，这还算是别开生面的巨著，值得称道。

此书分为前论和本论两部分。前论谈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和18世纪中欧文化的接触，本论才是关于中国哲学对西方的影响。这种安排在体例上是恰当的。作者在前论中，举出我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作者能够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火药这一段话来说明资产阶级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来攻破封建堡垒和消灭封建制度的作用。可见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各种问题。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四二七页）马克思这一提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我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对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的条件，而且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换一句话说，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和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由此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所以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应该有以自豪。全世界都知道四大发明，有关著述也不少，但考虑到它们的社会效果，迄今尚寥寥无几。朱先生论述四大发明时，提到它们给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条件，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实以耶稣会士为媒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中一件大事。关于耶稣会士的性质，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史及世界史者不容忽视的。朱先生对耶稣会士的分析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他还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平生、专长和作品逐一介绍和评论，对研究耶稣会的学者帮助不少。我们从《耶稣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一章，可以窥见他们对宋儒理学的态度和意见，以及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正反两面的意见，有利于我们对此作比较研究。天主教各教会内部争论的“礼仪问题”，关系到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手段和方式，这个问题引起中外长期的争论，其争端集中于三点：（1）敬祖之礼。（2）祭孔之礼。（3）祭天之礼。换言之，即奉祀祖先牌位是否为宗教仪式？祭祀孔庙是否只为敬孔或含有异端的宗教意义？以上帝二字和以天字称呼造天地万物的真宰是否恰当？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人尊孔敬祖先与崇拜偶像不同，对教徒可以采取放任态度；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两派就提出反对。耶稣会士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调和的。大家争论不休，就向罗马教皇请示，教皇先后派钦差铎罗（1704年）、嘉乐（1715年）来华查办。终于1742年教皇本笃与四下谕：凡礼拜祖者不许吸收入教。这样就触怒于康熙帝，他批示：凡不许尊孔敬祖者就不准在华传教。因此传教事业不能发展达一百二十多年。本书对礼仪问题的争论，均有详细的交代和精辟的见解。故可喜。我们认为，礼仪问题的争论，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礼制和风俗习惯的注意和研究，自是一件好事；因而导致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几乎中断，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17、18世纪欧洲发生一个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重视理性，主张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提倡平等，要求法律公平。他们攻击旧制度下的专制政治和阶级制度，攻击罗马公教教会并批评

#### 4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在教会的精神支配下社会的愚昧和迷信。有些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变政体，但多数人希望有一位“仁君，开明专制君主出现。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实现启蒙运动思想。

启蒙运动大师如伏尔泰，莱布尼兹，揆内及百科全书派等人，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认识中国和孔子。在他们的著作中，表扬中国文化，称道中国的“仁君”和“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教人的伦理思想，主张欧洲以中国为榜样，借此来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政府、教会和社会。事实证明，18世纪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中国有许多方面是胜过欧洲的，朱先生在书中已经把启蒙大师关于中国的文物制度，特别是哲学思想的言论介绍出来，略加评论，大致不差。启蒙时代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极盛时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件承先启后的大事，今得朱先生表而出之，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它的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与启蒙运动有关，而且会受到中国思想的间接影响。但中国的影响是外因，而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思想才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者认为“受了中国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结果竟能应用中国思想以打倒路易王朝，发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样提法值得商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自由平等的斗争口号的提出，不完全受中国影响，同时也受到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民自有他们的传统革命思想和爱国思想来发动这次革命。

朱先生博及群书，对于哲学、历史和中西文化均有湛深的研究，著作亦多，其中已出版的如《扶桑国考证》、《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的影响》和《中国景教》，都是中外关系史中有独特性之作。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这一课题，要求高、难度大，非掌握中西有关资料，博通中西文化知识者无从着手。而朱先生胸

有成竹，奋笔直书，二三年间就完成此书的初稿，犹自视谦然，晚年又反复修改补充，勒成新本。为以后研究中外关系史者导乎先路，虽有小疵，无伤大雅。我们认为朱先生撰述此书，固然有追求真理，承先启后的目的，但亦有表彰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而激励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微意。这又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迄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用新观点写成的，材料丰富，内容充实，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这与我们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很不相称。这个学术上的空白，应该由我们迅速补填。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虽然是中外关系史一部分，但仍不失为内容丰富，成一家言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定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填补这个空白之功。广大读者一定以先睹为快。

1983年10月3日

于广州暨南大学

## 序 二

黄心川

朱谦之（1899—1972），字牵情，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一个数代从事医生职业的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继母抚养成人。民初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就读，在中学时已经熟读古代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记》等小册子。17岁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sup>①</sup>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亲聆学界名师教诲，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先后发表了《周秦诸子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文。

1919年中国大地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朱谦之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参加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编辑杂志，撰文抨击时弊，宣传无政府主义，提

---

<sup>①</sup> 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 2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国内报刊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毛泽东主席在北大工作期间曾与朱谦之讨论过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同年10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方获得释放。

1921年朱谦之离开北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求教。因不满意佛门的腐化、偷安生活，复断绝关系，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越3年，应厦门大学的之邀，出任教职。1924年辞职再度隐居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逋<sup>①</sup>的故居，悉心著述。1929年获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回国，任暨南大学教授。从1932年起，朱谦之先生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历尽艰辛，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曾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出资筹办《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研究的“考今”工作起过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把中山大学历史系办成了一个著名学系和研究机构，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理论干部。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朱谦之回到了久别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8年后又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对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4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全体人员并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

<sup>①</sup> 即林和靖。

部，<sup>①</sup> 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谦之担任了研究员。尽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学研究。1972年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5岁。朱谦之一生著述等身，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他撰写了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sup>②</sup>

朱谦之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化、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至今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因之他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善于用脑和手，每读一书，必不停地用朱笔圈点和摘录。在着手课题研究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的书目。他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十分注意，所以能够尽快地吸收和消化国外的研究成果，步趋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和开拓国内研究的新领域。他的国学底子深厚，知识广博，文理并茂，他写的《老子校释》序言，其辞藻之华丽，章句对仗之工整，用典之殷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过也。

这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朱谦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据我所知，此书可以算作他的最得意的著作，当然更是功夫下的最大的一部书稿了。他在生前曾对我说过，他写作此书一共化了40年的时间。1940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本书的最早的版本，但是他一直不满意，致力于重新修订和充实。1958年他自认为可以重新出版，并把书稿交给商务，商务也于1962年排出了铅样本，但随着“左”的思想抬头，此书最终在商务也未能印刷。为此朱先生在临终弥留之际，为此书不能面世，而落泪不肯瞑目。朱谦之先生的夫人也曾讲过，朱先生把此书看的比身家

<sup>①</sup> 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

<sup>②</sup> 关于朱谦之先生的著作，请参见《中国景教》一书的附录三：朱谦之著述目录。

#### 4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性命还重要。抗日战争期间，他专门做了一个口袋，将此书稿放在里面。每当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时，他别的不拿，只将书稿带在身边。由此可见此书的完成和出版之艰辛不易。所以它不仅只是一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还包含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和一片求真理的痴心，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提倡的精神！1978年中国大地迎来了春天，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繁荣，此书的出版终于有望。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关心下，1985年此书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并且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由于印数太少，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现在此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我想将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了。

此书的重版，受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此代表朱先生的夫人何绛云女士表示衷心感谢。原书作序者朱杰勤先生已经离开人世，这次重版对原序作了一些删节，增加了黄夏年先生的跋。是为序。

1997年8月28日于北京车公庄

# 前 言

一、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拙著《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以抗战期间，流行不广，旋即绝版。本书根据旧稿加以重要的修订与补充，以求更与内容相符合，改为今名。篇章顺序照旧，惟资料方面大为增加，尤以在北京大学善本室得以接触原始资料，如《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中国现状新志》之类，得益不少。又在1940年以后，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如马弗利克：《中国为欧洲的模范》（L.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of Europe）对于重农学派叙述甚详。小林太市郎所著《支那と法兰西美术工艺》，《支那思想とフランス》等皆前所未见，可供参考。又旧著出版后二年，牛津大学汉学家休斯（E. R. Hughes）在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序言第一章中曾数引用此书（伦敦版1942年，页12，20，32，序言X—XI）；又



## 2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1951年克利尔 (Creel) 在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页 325, 343, 所举研究中、欧文化接触的有德之赖赫淮恩 (A. Reichwein), 法之平诺 (V. Pinot), 英之哈得孙 (G. F. Hudson), 美之马弗利克、罗菩泰姆 (Rowbotham) 等七人, 其中第一即提及中国, 以我此书为代表。此书既经有人注意, 益感有修订之必要。新本立场观点均与旧著不同, 乃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 18 世纪两种哲学革命之说为今书的指导思想, 并力求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问题。

二、本书提出许多新论题, 当然须有极丰富的考证, 除尽力应用原始资料之外, 更参考现代欧洲及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资料。

(1) 赖赫淮恩:《中国与欧洲:18 世纪之理智的与艺术的接触》(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a, geistige and künstlerische Ziehungen in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23. J. C. Powell 英译: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25。

(2) 戈尔逊:《中国学书目》(Henri, Ce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5 vols, Paris, 1904—1924。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著作及中国礼仪问题各书目, 为最重要之参考。关于礼仪问题, 见第二册页 869—926, 第四册页 3125—3126, 第五册页 3580—3600。又同著者《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La Chine en Europe au XVIII e Siècle*), Paris, 1908; 《十八世纪中国与法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 e Siècle*), Paris, 1910。

(3) 平诺:《中国与法国精神哲学的形成》(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1932。此书可参考页 375 笛卡儿, 347—8 巴斯噶 (B. Pascal), 314—27 培尔 (P. Bayle), 329—33 麦尔伯兰基 (N. Malebranche), 390—6 费内龙 (Fènelon), 314—46 诸哲。